



求是学术丛书

张荣翼◎主 编

李 松◎副主编

董迎春 著

反讽时代的孤寂诗写

——当代诗歌话语研究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求是学术丛书

张荣翼◎主 编

李 松◎副主编

董迎春 著

反讽时代的孤寂诗写

——当代诗歌话语研究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讽时代的孤寂诗写:当代诗歌话语研究/董迎春
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2. 12
(求是学术丛书/张荣翼,李松主编)
ISBN 978 - 7 - 207 - 09563 - 3

I. ①反... II. ①董... III. ①诗歌创作—研究
IV. ①I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0583 号

责任编辑:李 珊

封面设计:语墨弘源

反讽时代的孤寂诗写

——当代诗歌话语研究

董迎春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 longpress. 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 yeah. net
印 刷 哈尔滨圣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 2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09563 - 3
定 价 30. 00 元

网络出版支持单位:东北网络台(www. dbw. cn)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总 序

自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以来,当代中国人文社科学术无论在质量还是数量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也存在不少弊端与误区。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学术研究的探索精神被经济的、功名的利益所绑架。于是,假命题出场,假冒赝品泛滥,这些都成为妨碍学术的桎梏。具有学术良知与历史担当的学者,应该视学术自由为生命、视学术真理为信仰。追求学术真理与思想独立的精神,这是学者的伦理品格和职业道德。哈佛大学的校训是拉丁文“VERITAS”,即“让真理与你为友”的意思,该校训来自格言“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这句简短的校训是人类大学精神、也是学术精神的珍贵遗产。

首先,为学贵在真诚。

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学者书写自己真实的生活体验,表达自己真实的心灵悸动,指向自己真实的灵魂皈依。以学术为职业,也以学术作为追问生命意义的存在方式,并且抵达值得献身的人类事业。这样的学问之途才是有热情、有抱负、有生命的学术追求。牟宗三曾经在《关于“生命”的学问》一文中论述五十年来的中国思想。他认为:“此五十年内,中国的思想界大体是混乱浮浅而丧失其本。此种悲惨命运的总原因,是在‘生命学问’的丧失。个人的



尽性与民族的尽性,皆是‘生命’上的事。如果‘生命’糊涂了,‘生命’的途径迷失了,则未有不陷于颠倒错乱者。生命途径的豁朗是在生命的清醒中,这需要我们随时注意与警觉来重视生命的学问。如果我们的意识不向这里贯注,则生命领域便愈荒凉暗淡。久之,便成漆黑一团了。”牟宗三说这番话的语境不同于今天,然而所面临的思想病态今天依然存在。他认为:“生命的学问,可以从两方面来讲:一是个人主观方面的,一是客观的集团方面的。前者是个人修养之事,个人精神生活升进之事,如一切宗教之所讲。后者是一切人文世界之事,如国家、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的事,此也是生命上的事,生命之客观表现方面的事。”他将个人一己之小与社会众生之大,概括为一种生命的学问,统一于一种生命的精神。学术研究也应该是关于生命的学问,“由真实生命之觉醒,向外开出建立事业与追求知识之理想,向内渗透此等理想之真实本源,以使理想真成其为理想,此是生命的学问之全体大用。”

走向生命的学问,需要有澄怀悟道的心态。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这一思想,正式提出了“虚静”这个理论范畴。“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老庄标举“虚静”,意指人在体悟玄妙大“道”时,应该摒弃功名利禄、死生情爱等世俗观念,即做到精神上极度虚无空明,纤尘不染。要做到绝对的“心斋”、“坐忘”,未免虚妄。然而,怀抱这种理想,践行这种修为,才有望朝向“同于大道”、“达于至道”之途。

其次,真知贵在趣味。

学问是什么?为什么追求学问真理?陶渊明夫子自道:“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他吟诗作文只为了“自娱”。梁启超 1922 年在《学问之趣味》中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为‘趣



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仅有个零了。我以为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活便成沙漠,要他何用?”生活需要趣味,求知也不例外。求学至乐莫过于以游戏心态观之。朱光潜说:“艺术的活动是‘无所为而为’的。我以为无论是讲学问或是做事业的人都要抱有一副‘无所为而为’的精神,把自己所做的学问事业当作一件艺术品看待,只求满足理想和情趣,不斤斤于利害得失,才可以有一番真正的成就。伟大的事业都出于宏远的眼界和豁达的胸襟。如果这两层不讲究,社会上多一个讲政治经济的人,便是多一个借党忙官的人;这种人愈多,社会愈趋于腐浊。现在一般借党忙官的政治学者和经济学者以及冒牌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所给人的印象只要一句话就说尽了‘俗不可耐’。”他揭示了学问这一事业具有超功利的特点。

这种无功利的心态,在庄子思想中体现为“物化”。“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后,若化为。”“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也,此之为物化。”庄子的“物化”意在泯灭主客彼此之界限,达到了物我两忘、物我同一的艺术境界,这是一种“无所为而为”的自由境界。钱锺书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他说的是唯学问是求的无功利心态。1929年夏,陈寅恪所撰王国维碑文中的一段话堪称杰作。其文曰:“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成怀思不能自己。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金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辞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上述谈的都是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趣味。



最后,真理贵在知行。

学术研究具有理论品格,而理论具有预言的功能,即通过揭示、阐明过去已经发生、或现在正在发生的具体现象,确立相对稳定的规则。这种理论的抽象能力需要高屋建瓴的综合思维。学术研究还具有实践品格,学者需要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寻找现实问题的发生点。如果脱离社会的实际,理论本身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学者需要实事求是地去分析社会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现象与倾向,在理论上进行恰当的概括。学术研究的知行合一,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时代语境之中,因此,学者应该有深刻的历史感。深入语境去探寻问题产生的现实原因、历史语境、历史发展及其历史传统。学术研究的历史感需要学者以求真务实的心态,在实事求是的现象分析与理论归纳中获得科学的结论。

总之,做一个真诚的人,是对研究者品性的要求;做一个有真趣的人,是对研究者生命境界的营造;做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是自我价值的完满实现。怀抱上述理想,我们创办“求是学术丛书”,也借此以明心志。此为序。

主 编

2012年10月20日



自序

经过多年来的学术训练,以及生命的秘密幽思的观照,笔者愈加感到语言表达的困难,以及在表达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比如观念的前后差异,比如思考的轻浅,比如应该如何以生命体验介入有效的学术写作,如是等等。在诗性艺术的文学创作与规范谨严的学术写作之间的一系列写作问题的存在竟然让笔者不敢轻易放松、自在地写“字”,更不敢轻易提出有所创见的学术论点。这个“字”,既是文学创作中的感性文字,也是研究感性文学而形成的学理文字。面对这么多年来所谓的写作与研究的所谓“学术成果”,更是惶恐不安,感觉到学术研究之艰难。

我们试图为自己的“文字”寻找意义,试图说服自己、鼓起勇气,以真诚、向往的态度为自己过早出版学术著作找到某种理由。

十年磨一剑,也是学术某种企及的理想。

从2009年开始,在写作中笔者愈加感觉到当代诗歌书写中的“口语写作”所出现的问题,以及这个问题在“反讽”这个修辞的外衣包裹下,逐渐成为主流化、秩序化的诗歌写作,迅速占领、操控当代诗歌主要的出版刊物。诗歌本身所蕴含的精神气质、美学品质迅速与大众文化热衷接受的那种轻松、随意的趣味相趋同、合流。这种“口语写作”获得轰动的文化效应,同时也遭到读者的质疑和



反对。我们并非完全否定“口语写作”带给当代诗坛创作的刺激及启示,但是我们亦同样感受到“口语写作”背后所折射出的文化危机。

因而,笔者近几年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朦胧诗”以来的“口语写作”的反思,如何通过新的诗歌精神、形式的书写突破“口语写作”危机。反讽式的“口语写作”,呈现了当代诗人书写的立场,曾经贡献了他们在语言探索上的智慧。但是,这种诗学似乎游离了“诗歌”自身的诗性、诗思,背离了文学作为审美的精神追求。趋向中心化、秩序化的“口语写作”意味着诗歌精神与形式上的某种理论缺失。

反讽的诗歌书写,意味着一个反讽时代的到来,或者说,反讽式的诗歌书写与大众文化中的消费化、犬儒主义合谋,这个“反讽时代”意味着诗歌书写的某种完结(形式上单一化、雷同化)。同时它也意味着某种开始。在笔者看来,这个“开始”是对诗歌精神的传承,对文化的某种担当意识与所处“身份”的某种认同。以大诗写作、内歌唱、现代禅诗为代表的孤寂诗写,丰富与补充了当下“口语写作”的不足。

本书章节大多数以单篇论文先后发表于《社会科学研究》、《南京社会科学》、《南方文坛》、《北方论丛》、《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等理论刊物,现在将它整体出版,呈现给同行、读者。反讽成为话语中心的当下诗歌书写现状,如何从反讽成为中心的诗歌叙事中找回独立、自主的诗学精神与诗学本体,这是此书研究重点。这本书同时呈现了写作主体——我与诗歌的关联——笔者近十年来从习诗到从事诗歌创作教学、研究当代诗歌的心路历程,并不断进行跨语言的诗歌互译的文化实践,这里面也呈现出笔者对当代诗歌书写所持有的悲悯与孤寂诗写的精神的深刻认同,这种精神变成生命的态度深化了笔者对诗歌的深刻体验与理解,也丰富了在形式



上探求当下诗歌书写的可能性。

本书贯穿一条主要线索,“大众文化”的反精英、消费化倾向促成“反讽”作为主要书写策略在当下诗坛的盛行。远离严肃、愈加游戏为主的反讽书写渐成为当代诗歌的书写中心,并意识到当下诗歌写作必须返回诗歌的写作伦理。显然,“口语写作”在精神上与犬儒、市俗的“大众文化”合流。如何认识这种书写风气、潮流所具有积极价值、意义的同时,也考察其背后所潜藏、携带的话语危险、误区,也是此书关注的理论视角。

反讽式书写的发展线索,重点分析了以于坚、伊沙为代表的“转喻写作”,这里面既有推动当代诗歌的严肃写作、意义写作,也有取消意义、消解深度的与市场化、消费文化趋同的快餐写作、一次性写作。反讽式书写错综复杂、鱼龙混杂,这构成了1980年代以来文化上的多种消费景观。在多年的诗歌书写实践与诗学精神背景下,本书提出了“内歌唱”、“大诗写作”、“现代禅诗”等几种书写形式。这种种“诗写”形式为当代诗歌的重建提供了某种精神向度,推动当代诗歌话语的研究,也为评论创作实践与理论思考提供某种可能。

另外,此书还收录了有关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诗群”研究的论文。这两篇论文对“相思湖诗群”诗写的过去与现状均进行了归纳与阐述。“相思湖诗群”作为高校诗歌群体,是由广西民族大学历届师生组成的诗歌团体,他们均接受过较好的诗歌训练以及语言练习,比较接近“学院派”风格,坚持诗歌的诗学趣味与诗歌精神,他们也与“孤寂”发生关联。

之所以挑选《反讽时代的孤寂诗写——当代诗歌话语研究》作为选题,具体而言有以下四点思考:

第一,“孤寂”作为艺术的本体思考,成为笔者个人观照学术与生命的整体视角。读书、写作是孤寂的事业。大学期间笔者写下



了“写作是孤寂的事业”，这一“孤寂”就走了近十五年。许多在思想、艺术上做出成就的书写者，无不受惠于“孤寂”。伟大的文字都是孤寂中沉潜的思想结晶。

第二，“孤寂”作为艺术书写的内容与形式。艺术作品的书写离不开孤寂的书写，笔者从海子、昌耀、洛夫、西川等人的诗歌作品中，充分感受到反讽时代仍然有许多严肃诗人在进行严肃写作，他们远离反讽的否定性写作，坚守诗歌的诗意传统，赋予抒情与哲理的能量，在内容与形式上重返内心“孤寂”，远离跟风式的消费写作，让“孤寂”变成严肃的时代主题，“孤寂诗写”——确证了这类严肃的诗歌主题存在的意义以及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讨可能。

第三，“孤寂”是理论研究与文学艺术融通的中间地带。这样的孤寂，已经呈现了诗人、研究者的某种生命情怀与情感共鸣。如何在艺术的作品中观照理论的深度、高度、难度、厚度，“孤寂”提供了某种艺术的深刻性、精神动力。

第四，孤寂诗写，补充、修复反讽中的否定、消解功能，着力于反思、建构价值。笔者更热衷一个“文化诗人”所承担的道义责任。“孤寂诗写”呈现了某种重的品质与况味，这也算对时代之“轻”风的某种增补与参照。这一点，显然与“反讽时代”的文化形式与态度相冲突，但也呈现了一个“文化诗人”的写作伦理的旨向。于是，笔者更愿意做一个边缘人、局外者，守住这份内心的“孤寂”。孤寂，成为生命个体与艺术终极之间的情感地带，它让笔者清醒地面对现实生活，找寻抵达内心的可能。

与许多优秀的同行著作相比，总体而言，此书在火候、高度上与主观愿望还有一定距离。笔者不敢自视此书对学界同行、习诗者有多少话语启示。与其说这是对当代诗歌有所突破的话语研究著作，不如说这是一本在“反讽”成为当下表述中心的年代中，作为一个诗人如何去思考的心灵日志、精神索引，借此对严谨、美好事



物给予认同。因而,笔者鼓起勇气将这本小书献给所有关爱、帮助过笔者的师友。也深深感谢笔者所工作的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为青年学者成长所提供的宽松研究环境,让笔者有更多时间用于孤寂阅读、孤寂写作。

一个漫游者跋涉于存在之思,语言提供了灵魂的栖居之所,那里有着思想培育的故乡。仿佛“文字”的诱惑让他成为这样一类人中的一个——一个专注孤独的沉思者,一个对“美”有着坚定认同的理想主义者。如果这些文字有所寄托或者因为强烈有心的情感投射而给他者艺术上的共鸣,作为论者也就有了他的价值与意义。

这是所有学术研究永远追求的起点。吾将上下而求索,不断提升自我的表达能力与学术眼光。

2012年4月1日



目 录

导论 当代诗歌:走向反讽中心主义	(1)
第一节 反讽时代的“反讽”	(1)
第二节 “反讽”:当代诗写作的主要策略	(4)
第三节 “反讽诗学”的价值及缺失	(10)
第一章 第三代诗中的转喻写作	(15)
第一节 “朦胧诗”转喻	(16)
第二节 “第三代诗”转喻	(18)
第三节 “反讽叙事”转喻	(22)
第二章 第三代诗中的反讽叙事	(26)
第一节 “话语”及话语转义	(26)
第二节 伊沙:“反讽”式写作	(30)
第三节 反讽:“同一性”的切断	(35)
第三章 诗无体:口语写作的某种可能	(40)
第一节 “诗无体”命名	(41)
第二节 “口语写作”:诗意的生活	(43)
第三节 诗歌:生命的建制	(47)



第四章 第三代诗:走向文化消费	(52)
第一节 “第三代诗”概念考察	(52)
第二节 口语写作:解构语言、颠覆语义	(61)
第三节 “消费型写作”创作及缺失	(64)
第五章 内歌唱:当下诗歌书写之一	(68)
第一节 研究“内歌唱”缘起	(68)
第二节 “内歌唱”书写的哲学基础	(70)
第三节 “内歌唱”书写的美学基础	(74)
第六章 大诗写作:当下诗歌书写之二	(79)
第一节 “昌平的孤独”:为“大诗”作准备	(80)
第二节 “以梦为马”:激情与良知	(82)
第三节 大诗:“麦地”精神与“兄弟”之爱	(85)
第四节 大诗写作:普世性写作	(88)
第七章 现代禅诗:当下诗歌书写之三	(91)
第一节 禅与禅诗	(91)
第二节 洛夫:“现代禅诗”的书写者	(95)
第三节 现代禅诗:当代诗写之可能	(103)
第八章 孤寂诗写:当下诗歌书写之四	(106)
第一节 “孤寂”作为“诗写”的主要形式	(106)
第二节 “诗写”的理论特征	(109)
第三节 “诗写”的诗学意义与理论建构	(113)



第九章 黄翔：“孤寂诗写”的可能	(118)
第一节 当代诗歌史：解构与重写	(118)
第二节 黄翔：五十年诗歌光阴	(120)
第三节 黄翔诗学：暧昧与自主	(123)
第十章 如何阅读：走近当代诗歌	(132)
第一节 “难懂”作为诗歌的本质	(132)
第二节 “难懂”的诗学分析	(136)
第三节 阅读：走向深度体验	(139)
第十一章 重建当代诗歌书写的精神向度	(147)
第一节 当代诗歌的“口语中心化”	(147)
第二节 “口语写作”的“大众化”	(150)
第三节 当代诗歌书写的精神向度	(153)
附录一 多元共生态势下的“相思湖诗群”	(160)
附录二 “厚意载美，和而不同” ——“相思湖诗群”创作现状研究	(171)
参考文献	(184)
后记 “后死而生”：当代诗歌的写作可能	(199)



导论 当代诗歌：走向反讽中心主义

“反讽”在古今中外的诗歌中一直是一种重要的修辞策略，“反讽”同样也成为朦胧诗以来的当下诗歌书写中较重要的话语策略。反叛意识形态立场（朦胧诗）、颠覆社会既有价值体系（“第三代诗”中的“口语写作”一派），“反讽”的修辞推动了当代诗歌的发展。但是，“第三代诗”中的“口语写作”发展到了伊沙的“反讽叙事”，“第三代诗”以来的“口语写作”出现了某些问题。

反讽话语一方面积极推动了当代诗学建构，一方面也呈现了某种书写上的误区，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诗歌书写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反讽发展到话语转义的阶段，这时候的诗歌在诗学形式上是一种重大突破，但是，“反讽”成为一种转义也意味着成为某种中心化、秩序化所携带的危险。

第一节 反讽时代的“反讽”

“反讽”成为当下文化艺术的主要特征，它与“后现代”的消费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代诗歌书写代表着当下文化的主要特征，也渗透着反讽的表达策略。显然，“反讽已经成为这个文化的主调，我们只有尽可能了解反讽的种种特点，包括其弱点与强处，以及反讽演化的出路，才能找到能让文化新生的表意形式”^①。由“文革”地下写作

^① 赵毅衡：《反讽：表意形式的深化与新生》，《文艺研究》2011 年第 1 期。



而发展出的“朦胧诗”对“颂歌”与“战歌”不断进行解构、“第三代诗”对“朦胧诗”又进行颠覆,这里面都渗有“反讽”的修辞方式,20世纪80年代末,以伊沙为代表的“反讽叙事”把反讽推向了话语中心,且一直影响至当下的诗歌书写。

反讽,构成了当代诗歌书写最重要的书写策略,丰富了当代诗歌书写的修辞与艺术性,给当下诗歌书写增添了知性、智性色彩,使诗歌突破传统的抒情特征,重新确认诗歌书写的精神价值与意义,但是“反讽”过多地在当代诗歌书写中的策略性使用,也不自觉地走向反讽的“逻各斯中心主义”^①。从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脉络来看,“朦胧诗”开始尝试“反讽”(仅是艺术修辞方式中的一种)、“第三代诗”中的“口语写作”则将其作为文本主要修辞手段,而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的当代诗歌书写,“反讽”成为当代诗学主要的修辞语言、诗学思维与哲学态度。

反讽(irony)是西方文论最早的概念之一,但也是较难解释清楚的概念之一,也给人留下“臭名昭著,难以捉摸”^②的印象。反讽一词出自希腊文 eironeia,最初为古希腊戏剧的角色典型,说着傻话,佯装无知,这类糊里糊涂的“傻话”最后被证明为真理,从而让对手洋相百出,增加了思想的说服效果,成为一种说服有力的修辞术。“反讽的基本性质是对假相与真实之间的矛盾以及对这矛盾无所知:反讽者是装作无知而口是心非,说的是假象,意思暗指真相;吃反讽之苦的人一心以为真相即所言,不明白所言非真相,这个基本的格局在反讽所有的变体中存在”^③。柏拉图《对话录》中的苏格拉底经常扮演此类角色。一直到16世纪,“反讽”都是传统修辞学中一种次要的“修辞格”,从17世纪以来,德国浪漫主义文论开始,“反讽”概念不断扩大,由以往的语

① 参见笔者拙文《当下诗歌写作:从“反讽”到“歌唱”》,《海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本书认为当代诗歌写作“走向反讽逻各斯主义”,有效地从话语的层面指出了当代诗歌写作的口语中心化、集中化的写作倾向,反讽写作一开始以幽默、讽刺产生了较好的修辞效果,但是反讽写作的中心化、集中化,也不断暴露出口语写作的负面影响。

② D. C. Muecke, Irony, London: Methuen, 1970, p. 1.

③ 赵毅衡:《重访新批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页。